



伊朗与美国

从朋友到仇敌

从“美国人质危机”到“伊朗核危机” 美伊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恩怨？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riend
To Enemy

◎ 范鸿达 著

新华出版社

伊朗与美国

从朋友到仇敌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riend
To Enemy

◎ 范鸿达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 / 范鸿达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11-9935-8

I. ①伊… II. ①范…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美国、伊朗 IV. ①D871.22
②D83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9601号

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

作 者：范鸿达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张 程 唐波勇

封面设计：燕清创意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河北省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5.75

字 数：233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935-8

定 价：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 致 谢

2010年年底以来阿拉伯国家发生剧烈动荡，本已稍有平静的“伊朗核危机”风云再起，面对伊朗坚持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项目”，美国及其最坚定的中东盟友以色列一再施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一时间，“伊朗战争”仿佛又箭在弦上。导致目前伊朗危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核”，而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德黑兰与华盛顿的糟糕关系，伊朗与美国的敌对关系是催生“伊朗核危机”的“罪魁祸首”。事实上，今天对抗激烈的伊朗和美国在不远的过去曾经是一对十分友好的盟友，它们之间的对峙仅仅是1979年伊朗现政权建立后才出现的场景。在1979年之前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伊朗和美国的亲密关系举世皆知。那么，伊朗—美国的友好关系是如何建立发展的？这对曾经非常亲密的盟友又是如何走向关系破裂并对峙的？目前愈演愈烈的“伊朗核危机”实质是什么？它对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本书详细解读之。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诸多师友家人的相助，在此致以诚挚感谢：

感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杨辉先生。作为我的硕士导师，杨先生逐步把我带到中东研究领域。杨先生专攻巴勒斯坦问题研究，著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政治》等相关研究的开拓之作。当得知我有意撰写有关伊朗外交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杨先生给予我足够的鼓励和帮助，我与伊朗事务的不解之缘也由此建立。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怀揣着进京读博士的梦想，我2001年投师徐门，徐老师在研究选题上给予我充分自由。正是在她的鼓励支持下，我才得以继续伊朗问题的学习与研究，最终完成题为《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国伊朗关系》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

感谢厦门大学王旭教授。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在他的帮助与指点下，我继续关注美国伊朗关系，重点考察了伊美从友好走向敌视的过程，并对20世纪80年代的两国交往进行了深入剖析。王先生还积极为我的美国学术考察创造机会，2007年我的美国之行就是他努力的结果，正是在这次访学之旅中，我走访了美国国会、国务院、国防部等多个外交决策部门和多个外交智囊机构，为我的美国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David Menashri教授、Meir Litvak教授和Uzi Rabi教授，在上述机构和个人的帮助下，我得以前往以色列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在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中心访学期间，我充分利用那里丰富的学术资源，再次从事已经中断近三年的美国伊朗关系研究。我不仅开启了伊美关系研究的新阶段，还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对一些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与各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完成了目前呈现于各位面前的这部著作。

感谢学界同仁，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我曾与国内外同行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甚至还产生激烈争论，但是与同行的每次交流都能深化我对伊美关系的认识。

感谢我的学生游丽江，她的认真校对使本书更趋流畅。感谢新华出版社编辑张程先生，他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

和我其他著作一样，在感谢的名单中一定有我的家人，谢谢你们！

► 前 言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伊美关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79年11月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并扣押人质，几乎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在两伊战争中，美国伊朗在波斯湾展开海战；在伊朗核问题曝光特别是核危机形成后，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更是隔空怒视、剑拔弩张。三十几年来，没有任何国家比伊朗受到的美国制裁更严重；在伊朗每周五礼拜演讲中，也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受到的抨击更猛烈；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渲染则进一步凸显了伊美关系的糟糕状况。^①一言以蔽之，在当今国际社会，伊美交恶似乎成为应有之物，仿佛不如此就不是国际关系发展之常态。

难道美国和伊朗根本就是不能相容的两个国家？难道美国人和伊朗人根本就是不能相处的两个族群？历史和现实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回答。在巴列维国王主政时期（1941—1979），尤其是在1953—1978年间，伊朗曾经是中东地区的最亲密伙伴之一，美国也是巴列维王朝最为倚重的外部力量；民调显示，哪怕是在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伊美民众也互视对方为伟大之人民。近些年来，笔者接触了多位非官方美国人和伊朗人，他们

① 按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长期供职 CIA 和白官且从事与伊朗事务相关工作的布鲁斯·里德尔看来，1979 年以后的美国对伊朗政策是“从一个失败到另一个失败”，几乎没有可取之处。详情参阅 Bruce Riedel, “America and Iran: Flawed Analysis, Missed Opportunities, and Looming Danger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Fall/Winter 2008, pp. 101—111.

均认同对方人民爱好和平值得尊敬，均认为是两国极少数的政客和利益相关者绑架了原本应该正常发展的伊美双边关系。

世界各国首脑对他国“人民”的评价，几乎是清一色的赞誉之声，比如勤劳、勇敢以及对和平的无尚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国家间交恶又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否可以说明，那些政治家们不是谎话连篇，就是置“人民”福祉于不顾，执意与他国发生冲突？政治家的短见当然会阻碍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但如果把国家间的对抗全归咎于此，这会让同样辛苦万分的他们倍感委屈——即使是最为卓越的政治领袖，其活动也难以超越所处时代的限制；而那些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则无一例外不是顺势而为。与前人——也必定和后辈——一样，我们处于某一具体的时代，也处于某种变化的前夜，因此，我们会因为拘泥于现实的束缚而卑微生活，但是也会面临接踵而至的冲击而不得不改变自己。

是的，我们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也就难以用一层不变的眼光来看待它，本书探讨的就是美国伊朗关系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变化。

虽然美国早在1856年就与伊朗签署了《友好与商业条约》，借此获得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以及和欧洲列强一样的治外法权等优惠条件，但是伊美双边关系却没有因此而快速发展起来。事实上，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对英俄影响下的伊朗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漠视”源于它在那里没有太多的利益，在英俄两强已经分占伊朗的情况下，美国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挑战英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伊朗的石油资源逐渐被发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开创者礼萨王也有意以石油租让权为诱饵，拉拢美国以制衡长期盘踞于伊朗的英俄势力。这时尽管华盛顿的决策者的确心有所动，但是当英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时，美国政府断然终止与礼萨王的合作，这也直接导致老国王把目光转向希特勒德国，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厄运埋下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伊美关系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美国涉入伊朗提供了契机。二战爆发后伊朗相对于盟国的突出地缘战略地位以及糟糕的国家状

况，使得英俄两强不得不同意甚至请求美国力量进入伊朗，以确保援苏大动脉的畅通和英国本土与东方殖民地的有效连接。从1942年开始，数个美国顾问团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被派往伊朗，以帮助这个前一年刚刚经历国王被迫更迭的国家更好地运作和服务于盟国的作战。在二战后伊朗与苏联、英国的冲突中，已经深感冷战压力的美国均站在了德黑兰一边，帮助伊朗把苏联和英国势力排挤出去，这不仅沉重打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还赢得了更多伊朗人的心。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已经成为对伊朗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国家，伊美关系的热度逐渐升温。在伊美关系发展史上，1953年是一个值得重点提及的年份，在这一年，美国谋划运作了一场政变，成功推翻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摩萨台政府。此前远走他国的国王再次回到伊朗的权力中央，之后他就一边倒地执行亲美路线。从这一角度来讲，1953年政变的成功可视为伊美亲密关系确立的盛大庆祝仪式。

借助1953年政变重掌国家大权的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感恩戴德，冷战的深入快速发展也让华盛顿对苏联的南部邻国伊朗有所期盼。一个要借助对方巩固不甚稳定的统治，一个要借助对方遏制苏联向中东、印度洋地区的扩张，伊美双方各取所需，历经了蜜月期。在从1953年政变后重拾大权到1979年年初被赶下台的26年中，巴列维国王苦心经营，竭力维系着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等历任美国总统也均给予伊朗相当大程度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向伊朗提供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国际安全等全方位的援助使巴列维国王基本度过了权力动荡期。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巴列维国王筹划的“白色革命”就有迎合肯尼迪总统之嫌。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唤起了伊朗人民的殷切期望，但也招致了教士等阶层的强烈反对。正是在此背景下，霍梅尼被巴列维国王流放海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巴列维国王始终都没有认同过肯尼迪总统的改革压力，以致他在流亡海外的岁月中直言“60年代初期对我们来说是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它正好也是肯尼迪政府开始执政，美国加紧阴谋反对我国的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恰恰是在肯尼

迪政府时期，美国的盟友巴列维国王最终牢固地确立了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定激发了巴列维国王日益高涨的国际诉求，他要使伊朗成为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领袖，为此他立志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完成此等夙愿的必经之路就是大量先进武器的获取。尽管约翰逊政府没有完全满足伊朗的先进武器需要，但是巴列维国王的武器现代化诉求得到尼克松政府的积极响应。在尼克松政府的美国新战略中，伊朗被赋予了波斯湾地区警察的角色，被看做是维护波斯湾稳定以及西方在此利益的地区领导者，所以美国该届政府对巴列维的武器诉求大开绿灯，至此伊美关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福特继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对伊朗政策方面可以说是萧规曹随，继续满足巴列维国王对美国大量先进武器的渴求。经过数百亿石油美元的投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的军事力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波斯湾地区的第一军事强国。但是伊朗的财富是有限的，在军事上的过多投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对其他领域特别是民生的投资，所以，在美国满足巴列维国王的愿望向伊朗大肆出售武器的同时，伊朗民众对巴列维国王和美国的不满也在不断加剧。

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多，在与国王对抗的力量中，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阶层充当了排头兵。正当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统治遭遇日益严峻的国内挑战之时，以“人权总统”自居的吉米·卡特于197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在此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巴列维国王就对一再强调人权的卡特忧虑重重——如果卡特当选并且把人权理念付诸实施的话，国王的独裁专制显然是要深受抨击。所以，随着卡特出任总统的趋势日渐明朗，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做出一些尊重国内人权的姿态，实施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在与卡特总统密切交流后，巴列维国王才意识到这位高唱人权之歌的美国新总统与前任福特和尼克松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对待伊朗时也是充满了友好。1978年新年之际，卡特总统在德黑兰的“稳定岛之说”就是对巴列维国王和伊朗的巨大褒奖。但是巴列维国王对卡特政府太过于乐观了，一旦美国决策者认识到伊朗正在面临日益加剧的混乱，他

们对巴列维国王的态度就不再一致了。1978—1979年反对国王的伊斯兰革命最高潮之时，美国决策层对伊朗局势和国王的未来也展开最为激烈的纷争。纷争的结果是，美国政府要置二十余年的亲密朋友巴列维国王的个人安危于不顾，接受伊朗革命的事实，并寻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阵营的联系。美国的立场使得巴列维国王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万般无奈，只好在1979年1月中旬踏上流亡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巴列维国王对卡特政府的见死不救甚为不满，甚至认为是美国把他赶下了台。这位亡国之君至死都没明白，相比较他本人，美国更看重“伊朗”；相比较美国紧要关头的“背信弃义”，他的下台源于其在国内的不得人心。不过巴列维国王也有一个预见应验了，那就是他的下台会使美国失去一个中东利益的有力维护者——伊美长达二十余年的亲密关系的确随着巴列维国王的倒台而宣告终结。

卡特政府之所以断然抛弃巴列维国王这位几十年的老朋友，就是为了能够赢得伊斯兰革命者的好感，从而与新伊朗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卡特总统对未来的伊美关系充满幻想，不过伊朗新的主宰者阿亚图拉·霍梅尼却让他失望了。1963年霍梅尼被流放伊拉克的直接原因就是反对给予在伊美国人治外法权，而长达15年之久的流放生活没有减损霍梅尼对美国的憎恶。他认为伊朗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因此，他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都要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并加以反对之。卡特政府继续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自然就沦为白日梦。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的激进青年冲进美国大使馆，将使馆中的六十余人扣为人质。这一事件立即引发美国内部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反伊朗情绪由此骤然提升。在历经几次外交磋商无果后，卡特总统最终放弃了与新伊朗继续交好的幻想，决定在1980年4月以军事手段来解救人质。这一方案的实施对美国而言是又一个悲剧——竟然由于自身的失误而使此方案在还没有完全展开之时就已经失败，美国遂在4月7日宣布与伊朗断交。此时卡特总统面临的压力不可谓不大，既要面对国民的责难，又要面对几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霍梅尼不仅要努力维持国内的政治平衡，还要应对迅速恶化的与伊

拉克的双边关系。各自沉重的压力令美伊决策者都希望尽快解决人质危机，于是双方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重返谈判解决人质问题的轨道。经过冗长的谈判，1981年1月20日，即在新任总统里根就职典礼当天，美国人质最终获救离开伊朗。长达444天之久的美国人质危机给美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它推动美国政府走上与伊朗新政权对抗的道路，伊美由此拉开了交恶大幕。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的强烈反美情绪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地区盟友；旷日持久的人质危机则使伊朗收获了一个世界大敌。伊美交恶给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带来大麻烦，经受德黑兰人质危机之痛的美国很快就得到报复伊朗的机会——1980年9月爆发的两伊战争。当然，推动华盛顿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的因素不只是刚刚发生过的人质危机，还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和中东形势的变化。新的情势使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而此时德黑兰又推行激进的反美政策。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华盛顿站在伊拉克一边对抗伊朗，这实属可理解之策。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质获救、里根宣誓就职后，华盛顿越来越倾向于支持萨达姆主宰下的伊拉克，比如1982年2月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这为伊拉克向美国购买军民双重用途的装备和技术打开了方便之门；里根总统命令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和建议；美国一些空军军官被秘密派往伊拉克协同作战；里根总统派遣中东事务特使、后来出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亲赴伊拉克并会晤萨达姆；1984年与伊拉克恢复了1967年中断的外交关系，等等。尽管在两伊战争期间也爆出了美国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的“伊朗门事件”，但是这对双方而言都只是权宜之计，对两国关系并没有产生任何正面影响。相反，在丑闻曝光后，焦头烂额的里根政府推出更具对抗性的行动——在波斯湾直接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军事的直接介入打消了伊朗取胜两伊战争的最后一点念头。万般无奈之下，霍梅尼于1988年8月接受了联合国的两伊停战协议。

1989年6月，也就是两伊停战10个月后，一直持强烈反美立场的伊朗最

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具有一定革新精神的新领导层走上前台。这为伊朗外交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1989年也是美国政府更迭的年份，乔治·H·W. 布什在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新任总统，美国也迎来政策可能调整的时刻。虽然布什政府起初基本延续了前任政府的伊朗观，认为是伊朗而非伊拉克对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造成更大威胁，但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并引发海湾危机，这宣告了美国既有海湾政策的失败，华盛顿不得不直面“朋友”萨达姆带来的严峻挑战。海湾危机及其后战争的爆发，给美国伊朗关系的调整带来机会。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发生后不久，华盛顿就着手组建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伊朗是伊拉克的近邻，而且刚与之作战八年，自然是美国努力争取的目标之一。美国通过土耳其和瑞士联系德黑兰，寻求伊朗对多国部队行动的支持。美国等国还主动提出帮助伊朗获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建资金。面对华盛顿抛来的“橄榄枝”，以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拉夫桑贾尼为首的伊朗新决策层认真考虑，他们显然也非常渴望能尽快走出伊斯兰革命后的国际孤立困境，也深知若不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本国的发展就难以获得更好的外部环境。就这样，德黑兰和华盛顿的对抗烈度因为海湾危机而稍有降低。但是好景不长，面对海湾战争后周边的一片哀鸿，伊朗难掩对波斯湾霸权的向往，而竞争对手苏联的轰然倒塌，美国自然也会有充当世界唯一领袖的冲动，伊美诉求的如此差异，基本注定二者关系发展的艰难。虽然伊美在海湾危机及其后战争中建立了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好的合作关系，但它终归是昙花一现，伊朗很快就再次被美国及其中东盟国视为地区动荡之源。1993年1月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立即把伊朗列入主要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接连推出一系列制裁伊朗的措施，这给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障碍。1997年哈塔米出任伊朗总统后，他虽然努力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也曾经与克林顿政府一道做出某些尝试，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伊朗美国关系的发展依然不见起色。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伊美关系发展令人失望的话，那么在乔治·W. 布什（后文中也称之为“小布什”）总统当政的大部分时间内，两

国的互动就因为伊朗核危机的爆发而让人心有余悸了。在伊朗核危机爆发以前，小布什政府与伊朗也有过一段合作期。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随着美国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确定为首个打击目标，寻求伊朗的支持就成为华盛顿的一个既定目标。伊朗是阿富汗的邻国、阿北方联盟的支持者和塔利班政权的敌对国，它的这些角色对旨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美国而言显然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华盛顿和德黑兰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一事上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又围绕阿富汗重建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合作。但是对于高举反恐大旗的小布什政府而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成为权宜之计下的助手，但绝非是一个可以长期相谋的伙伴。在历经“9·11”惨剧后，小布什政府把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核扩散视为重中之重。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企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的“邪恶轴心”，反对派对德黑兰核发展的揭露则进一步把伊朗推向小布什政府的对立面，此外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其后伊拉克的政治安排也引起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激烈争吵。这样，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伊朗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美国媒体也以“日益迫近的对伊朗战争”为题密集报道渲染之。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力劝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看来，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使自己朝不保夕，所以一定要对伊朗核计划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甚至直接摧毁之。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德黑兰仍没有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这并非完全是德黑兰对核武器的渴求之心无法遏制，也有伊朗国内能源和经济发展困境的影响，它的确需要核能。伊朗核问题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牵动全球的危机，从本质上讲，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美国、以色列长期交恶的结果，是糟糕的伊美、伊以关系催生了伊朗核危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尽管奥巴马总统高举变革大旗入主白宫，但他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以对抗为特征的伊美关系总体框架仍然存在。

通览百余年来的美国伊朗关系，特别是二战及其后这六十余年的两国交

往，其变化之剧烈让人感叹不已。在半个世纪的关系淡漠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带入伊朗；惨烈的冷战则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伊朗在遏制苏联方面所能起到的无可取代的作用，而巴列维国王也需要强大的美国帮助自己实现对其国家的牢固掌控，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演绎出伊美关系史上的“蜜月”期。但冷战终归是个历史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很多影响伊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于是友好程度日益降低的伊美关系最终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而灰飞烟灭。事实上，尽管美国和伊朗在冷战时期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但是双方对对方的重视程度是有重大区别的，也就是说，对华盛顿而言，伊朗只是其整体外交的一颗棋子，可对德黑兰而言，美国却是其外交战略的支柱，在如此情势下，就伊美关系而言，伊朗比美国更具有脆弱性，换言之，德黑兰对伊美关系恶化的抗压能力要远远低于华盛顿。失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最终在1979年年初流亡他乡，伊美亲密关系也宣告结束。其实，即使是在伊美关系亲密时期，伊朗官方和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是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1953年美国主导了伊朗政变之后，随着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逐渐建立独裁统治，伊朗民间对国王和美国的憎恶之情就逐渐升温。值得深思的是，时下的伊朗又呈现出官方和民众对美国不同的态度，只不过这次和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状况正相反，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伊朗民众对美国充满好感。伊朗在短短几十年中，竟然出现两次官民对美国态度不一甚至相反的情形，这实乃伊朗国家之不幸也！对同一事物认识不一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伊朗，比如对“9·11”后美国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大张旗鼓进行的反恐战争，华盛顿就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很多伊斯兰国家的观点相左，实践证明，美国以“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并没有起到设想中的“反恐”作用，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一些主张也未必不值得华盛顿去认真思考。跌宕起伏的美国伊朗关系的确给现后世的决策者留下足够多的启示，例如外交要注重多元化，国家发展方向和目标一定要切合实际，内政外交要力求平衡，以及情报信息的获取要做到多渠道等。未来的伊美关系如何演绎？像目前这样的激烈对抗很难再长期延续，非战争途径的逐步缓和将会是伊美关系

改善的最有可能之举，当然，突发状况下的两国战争也是结束伊美对峙的可能途径之一。

伊朗和美国的长期对抗给中国外交出了道难题，因为中国和这两个国家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对1949年后的中伊关系而言，美国的确是个大麻烦，在残酷的冷战年代，由于中国伊朗分属苏联和美国阵营，中伊缺乏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外部环境，只是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缓和以及巴列维国王独立性日趋增强后，中国和伊朗这两个历史上曾长期友好的国家才迎来关系良好发展的当代篇章。然而，当代中伊关系实在多劫难，在1979年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又和美国陷入了延续至今的激烈对抗，华盛顿也因而对德黑兰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伊关系的发展就深受伊美对抗的制约了。目前中国把伊朗视为重要的中东合作伙伴，因为伊朗在石油供给、商品销售、保障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以及国际支持等方面可以给中国提供帮助。对于未来的中伊关系，仍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双方对对方的需求程度也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指标。在考察影响中伊关系发展的因素时，尤其要关注伊美关系的可能变化。毋庸置疑，如果可以选择，德黑兰更倾向于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不具备伊朗所急需的先进技术，而这恰恰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项，此外，目前美欧大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是一个潜在或现实的挑战国，一旦伊朗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了，中国再期待还能够获得来自德黑兰的像目前这样的友好对待，那就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了。对中国而言，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如果做好整体外交、区域外交和单个国家外交的关系处理，将会是必然要面对的课题，遇到挑战是必然的，重要的是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并掌握必要的利益取舍之道。

► 目 录

致 谢	i
前 言	1
第一章 伊美友好关系的建立	1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伊美交往	3
二 美国涉入伊朗	8
三 伊美友好关系的建立	14
第二章 伊朗与美国的蜜月期	27
一 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美国对伊朗的援助	29
二 肯尼迪政府与伊朗的改革	33
三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建设	39
第三章 伊美友好关系的终结	53
一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危机	55
二 “人权外交”对伊朗的影响	59
三 卡特政府初期的伊美交往	63
四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和美国的初始反应	66

五	卡特政府抛弃巴列维国王	70
六	“谁丢掉了伊朗”	72
第四章	“美国人质危机”	79
一	美国人质危机爆发	81
二	美国对人质危机的初期应对	87
三	人质危机的最终解决	92
四	伊美交恶	94
第五章	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和美国	97
一	两伊战争的爆发	100
二	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国立场	104
三	“伊朗门事件”	109
四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	114
第六章	伊美关系的僵持	119
一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美关系	122
二	哈塔米、克林顿改善伊美关系的尝试	135
第七章	反恐视野下的美国伊朗关系	145
一	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伊朗的反应	147
二	“伊朗核危机”的爆发	155
三	以色列推动美国攻打伊朗	160
四	伊朗核发展的动力及其对核危机的看法	164
五	奥巴马的伊朗政策	168
六	伊朗会是美国下一个战争目标吗?	170
第八章	伊朗美国关系纵论	175
一	冷战是塑造伊美友好关系的关键因素	178